



抗战时期的大西南丛书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南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 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 抗战时期的大西南丛书 •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南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 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0·成都

责任编辑：刘运勇

封面设计：邱云松

技术设计：何 华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南

政协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 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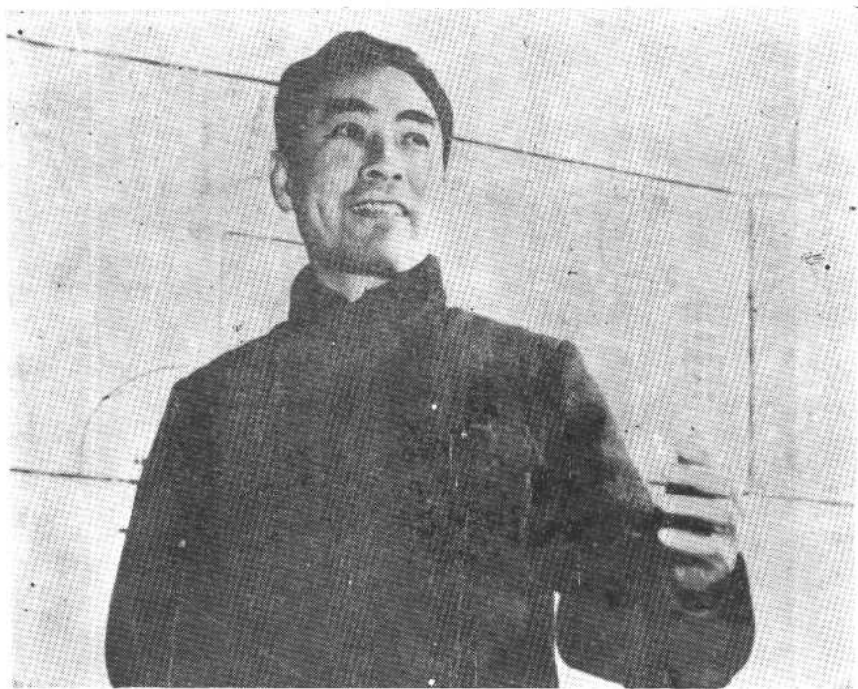
成都科教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13 插页 3 字数 300千

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7—220—00979—8/K·129 印数：1—8,000

定价：3.50元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50号住地

周恩来为纪念抗战两周年题词

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
途妥协！坚持统一战线，
反对内战！团结全国
人民，反对侵略！
七年斗争纪念
周恩来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南》

编 审 人 员 名 单

主编 吴汉家

编审（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金平 王小晓 王幼麟

陈开国 陈克炜 宋海常

李吾舟 吴琼芳 杨耀建

张建军 戴迎春

《抗战时期的大西南丛书》出版说明

抗日战争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对于中国革命历史的发展具有扭转乾坤的伟大意义。西南是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它为取得抗战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重大贡献。编纂《抗战时期的大西南丛书》（以下简称《丛书》），目的在于促进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服务。

《丛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原则，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力求真实地反映当年西南地区全民全面抗战的情景和巨大变化，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丛书》以亲历、亲见、亲闻史料为主，根据抗日战争时期大西南的实际情况，拟编辑出版七本书，即《大西南的抗日救亡运动》、《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工商企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南》、《抗战时期西南的金融和交通》、《抗战时期西南的文化事业》和《西南各族民众对抗战的支援》。上述各书均由四川省政协、云南省政协、贵州省政协、西藏自治区政协、重庆市政协、成都市政协、昆明市政协、贵阳市政协及拉萨市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部门参加的政协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辑，并于1991年前陆续出版。

这套《丛书》得到各界人士和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各方面人士热情地为本《丛书》撰稿，分别寄给上述协作单位汇编成书出版、发行，实属费心尽力。本《丛书》各协作单位特此深表谢意。

前 言

中国共产党建立和领导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民主革命时期，它是夺取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它仍然是实现四化、统一祖国的一大法宝。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有着不同的性质、任务和内容。在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的努力和准备，创造性地提出并实行了一整套动员和组织全民抗战的理论、方针、政策和策略，至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正式达成了共同抗日的协议。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成为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重要条件，也为以后统一战线的发展壮大奠定了牢固基础。

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高举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遵循党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贯彻“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坚持国共合作，抗战到底。对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和措施，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大力加强了对国民党民主派、各民主党派、文教科技界、工商经济界、地方实力派、民族宗教界、海外侨胞等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工作，在挽救民族危亡中，与他们风雨同舟，共同奋斗，发展壮大进步势力，争取了广大中

间势力，孤立了顽固投降势力。同时，广交外国朋友，争取了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从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矛盾多次激化的尖锐复杂的斗争中，保持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局面，直至抗日战争取得胜利。

本书提供的亲历、亲见、亲闻及综合整理的史料，集中反映了1937年至1945年间西南地区的上述历史进程，即：

——南方局的领导同志，党中央指派到西南工作的同志，各地党组织的同志，在西南地区从各种渠道，以灵活多样的方式进行艰苦细致的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周恩来同志以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怀，平等待人的民主作风，严于律己的高尚品德，在各界人士中赢得的崇高威望，产生的巨大影响。

——国民党民主派和聚集在中国共产党周围的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广大知识分子，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逐步形成政治力量，以西南为基地，在南方局的指导和帮助下建立民主党派、团体，与中共结成政治联盟，团结无党派爱国人士同舟共济，为抗日救国，为争取民主政治作出的贡献。

——西南的地方实力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从抗战的大后方到抗日前线，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为抗日、民主作出了贡献。他们的道路是反复曲折的，但最终“由反共到亲共，走到人民阵营。”

——西南地区的文化、新闻、妇女和民族宗教等各界爱国人士，团结广大群众，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组织活动，在坚持团结抗战和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搞分裂倒退的斗争中，显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南地区的广泛力量。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其内容的广泛性和复杂性，远非本书所能包纳。因此，本书收入的稿件，只能是记载抗战时期党在西南地区统战工作的某些侧面，记载部分中上层人士根据亲身

经历所写的回忆，以及必要的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他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的活动。目的在于通过这些历史见证人的可贵记述，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为发展新形势下的爱国统一战线服务。

本书是《抗战时期的大西南丛书》之四，由政协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的参加单位通力协作编辑而成。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客观公正地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突出政协出版物的特点。但由于篇幅和编者水平的局限，缺漏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尚祈读者惠予指正。

本书的征集、编辑和出版，得到作者和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谨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编 者

1989年9月

目 录

抗战时期南方局统战工作的回忆与体会·····	许涤新 (1)
在南方局领导下进行统战工作的片断回忆·····	彭友今 (9)
大后方的两次宪政运动高潮·····	刘 炼 (20)
周恩来在重庆与外国人士的交往·····	王光荣 (40)
我在四川做统战工作的一段经历·····	张曙时 (48)
我在抗战期间从事统战工作的回忆·····	张秀熟 (57)
抗战时期贵阳地区的统战工作·····	尹克恂 朱崇寅 (67)
中国民主同盟的历史由来和演变·····	叶笃义 (78)
抗战期间云南的民盟工作和民主运动·····	楚图南 (85)
从事抗日民主活动的回忆·····	潘大逵 (93)
云南的爱国民主运动·····	冯素陶 (106)
略谈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形成和发展·····	邓后炎 (116)
从科学座谈会到九三学社·····	谢立惠 (124)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的陶行知·····	龚思雪 (132)
冯玉祥先生和“利他社”·····	冯子源 (143)
杨杰将军在抗战中的活动·····	张民义 (155)
追随红军长征北上抗日的周素园先生·····	周定一 王稼和 (166)
抗日民主运动战士李相符教授·····	李实育 (177)
先父刘方岳在抗战期中事略·····	刘君桓 (191)
怀念党的忠诚朋友饶国模·····	钱之光 童小鹏
·····	刘 昂 牟爱牧 (197)
记抗日战争时期的卢子英·····	唐宜存 (203)

张志和在抗战时期的统战活动·····	李 烽 (211)
记抗战期间在昆明的一些民主人士·····	杨春洲 (218)
冯玉祥派我劝说刘湘参加抗战·····	高兴亚 (225)
我做刘文辉工作的经过·····	张友渔 (237)
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	刘文辉 (248)
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	龙 云 (260)
争取云南地方实力派的工作·····	李群杰 (271)
抗战时期的邓锡侯·····	陈宇康 (279)
党对潘文华的统战工作·····	童史正 (285)
记滇军中的统战工作·····	杨永新 (290)
在云南设立秘密电台的经过·····	杨 才 (294)
周恩来与工商界人士交朋友·····	廖申科 (297)
回忆西南实业协会·····	廖石城 (305)
相遇贵相知·····	古耕虞 (310)
党知我心 我跟党走·····	周宗琼 (314)
回忆文化工作委员会·····	阳翰笙 (323)
难忘的深情教诲·····	罗承烈 (340)
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成都分会·····	刘克俊 (346)
贵阳战时社会科学座谈会·····	萧家驹 (362)
格达活佛与朱德总司令的友谊·····	周锡银 (366)
我在阿坝地区做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工作·····	彭玉鸣 (372)
基督教爱国人士吴耀宗·····	汪仁泽 (377)
中共南方局领导的妇女运动概况·····	廖似光 (381)
抗战时期云南的妇女运动·····	李文宜 (387)
遵义青年的抗日救国活动·····	陈福桐 (396)

抗战时期南方局

统战工作的回忆与体会

许 涤 新

八年抗战是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进行的一次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对于促成全民族抗战，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坚定不移地实行民族团结、抗战到底的方针。国民党领导集团从实行不抵抗主义转而实行抗战，从实行内战政策转而实行国共合作，是受到人们欢迎的。在国共两党合作下，抗战初期，全国军民一致奋起，走上抗日救亡的前线，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在对日作战的正面战场上，国民党许多爱国将领和他们的军队，坚持与日军浴血奋战，不愿搞反共摩擦。但是，国民党领导集团的反共立场未变。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对抗战逐渐消极，对民族团结设置重重障碍，执行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中共中央为了坚持民族团结、抗战到底，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克服破坏团结和抗战的消极因素，适时地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总方针。

本文作者许涤新原系中共南方局工作人员，解放后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已故。

自1938年10月下旬武汉失守之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中央和政府迁到陪都重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也设在这里。各民主党派集中在这里活动。高级知识分子和民族资本家也从各地集中到这里。依据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总方针，南方局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支持国民党合作抗日的一面，克服其破坏团结抗日的消极因素，要在揭发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斗争中，争取中间党派、地方势力、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使他们认清形势，逐步摆脱国民党的消极影响，同我们一道前进。

在执政的国民党内部，除顽固势力外，还有一部分是要求团结抗日的进步人士，如冯玉祥、李济深、于右任、邵力子、张治中、贺耀祖、王昆仑、朱蕴山、朱学范、李德全、倪斐君以及曹孟君等。他们当中有些人还是国民党当权派。众所周知，张治中曾三上延安。1945年8月，他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首次到延安，邀请毛泽东主席赴重庆谈判，并将其在重庆的公馆“桂园”主动借给毛主席，作为在渝期间会见各方人士之用。《双十协定》签字的第二天，由于周恩来的联系，他亲自护送毛主席飞返延安。1946年春，他又以最高军事三人小组成员的身份第三次到延安。当晚，党中央在杨家岭设宴招待，张治中在宴会上说：“希望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由此可见张治中与我们的关系。

贺耀祖早就同我党有联系，他的夫人倪斐君对南方局妇女组的工作贡献颇大。在曲折的道路上，他们一直同我们合作。

另外，还有一个陈布雷，是蒋介石的亲信，我们通过他的女儿陈莲（中共党员）专门做他的工作，使陈布雷在政治上感到矛

盾，无法解脱。

由于对国民党顽固派和民主派区别对待，促进了国民党内部的分化。

对于国民党机关（包括其报社）中的工作人员，我们也进行了统战工作，不少国民党的政治经济情报，是从其政府机关的中下层干部那里得到的。

二

作为中间势力的各民主党派，是我们团结争取的主要对象。当时的民主党派有救国会、第三党（后改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简称职教社）、乡村建设协会、国家社会党和青年党。其中救国会是中间党派的左翼，它相信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正确性，相信中国的前途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著名的救国会领袖七君子中的沙千里和邹韬奋，后来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李公朴后来在昆明为民主事业献出了生命。

在这些民主党派中，代表中华职教社的黄炎培是中间力量的典型人物。周恩来、董必武和王若飞等同志，都对他做了不少工作。后来，他终于放弃中间立场，逐步向我党靠拢。

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救国会、第三党、职教社、乡村建设协会、国家社会党和青年党，在重庆秘密成立民主政团同盟（简称民盟，1944年9月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即不以政治团体而以个人为其成员），同年10月在香港创办了民盟中央机关报《光明报》。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一举占领了香港，《光明报》被迫停刊，民盟失去了重要的舆论阵地。为了便于公开地开展工作，民盟领导人张澜等在重庆以举行参政员茶话会的形式，公开了民盟组织，使蒋介石大为恼火。那时，一些小党派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才不会被蒋介石吃掉。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对

当时国内的政局，发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皖南事变以前，不少民主党派是站在中间立场的，有的甚至倾向国民党。皖南事变以后，他们痛切地感到国民党的横暴和自身生存的危机，虽然仍旧标榜中间立场，但却逐步向我党靠拢。救国会是一贯同我党亲密合作的。第三党和中华职教社这时也有着明显的变化。至于国家社会党和青年党，原来就是中间党派中的右翼，他们后来被国民党所收买，公开投靠了国民党。但总的说来，民主同盟并不因此就丧失其中间偏左的性质。

三

南方局领导同志，特别是周恩来，对知识分子做了大量的工作。郭沫若、邹韬奋、陶行知、马寅初、沈钧儒、洪深、翦伯赞、邓初民、侯外庐和沈志远等人，都是周恩来和董必武经常接触的朋友。郭沫若在那时的文化界，成了吸引千百万抗日青年的一面旗帜。大约在皖南事变后十个月左右，周恩来每晚都到民生路《新华日报》门市部二楼会见各方朋友，不仅谈团结抗战，而且谈历史、谈哲学、谈戏剧、谈经济等等，所谈内容因人而异，绝不千篇一律。这样就把抗日救国的道理同来访朋友的专业结合了起来，更易使人接受。这是在政局恶化条件下进行统战工作的一种较好的方式。同时，还采取做生日、开纪念会等形式，加强与各界朋友的接触，有效地宣传了党的政策。如：郭沫若创作二十五周年和五十大寿，洪深的五十大寿，沈钧儒的七十大寿期间，都是以开展纪念活动的形式，谈抗战、谈团结、谈民主。沈老做寿那天，不但于右任、李济深出席，而且CC系干将陶百川也出席了。在大家纷纷指责国民党法西斯统治和对抗战动摇的时候，在场的国民党中央委员陶百川处境十分尴尬。

1938年10月，处在十分危急时期的武汉，召开了纪念鲁迅逝

世两周年大会。周恩来到会并发表了演说。在重庆，周恩来也出席了几次纪念鲁迅的会议。有一次，他从文化上和政治上对鲁迅与郭沫若作了正确的评价。每一次纪念鲁迅的大会，都开成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和提高士气的会议。

在蒋介石指定直接与中共联系的国民党代表张冲的追悼会上，周恩来送了“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挽联，并发表了讲话，指出：“追悼淮南（张冲别号）先生，当继其志，加强团结，共御外侮。”这无疑对国民党中的一些人士产生了影响。

不仅利用红白喜事宣传抗战，而且还把戏剧作为武器，让其在抗战中发挥应有的作用。郭沫若在重庆时期创作的《棠棣之花》、《孔雀胆》、《屈原》等剧本在重庆上演，反映十分强烈，特别是《屈原》一剧的演出，轰动了山城，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从而更自觉地投入抗日民主斗争中去。在每次上演之前，周恩来总是同郭沫若一起研究修改剧本；在上演之后，又及时组织南方局文委的有关干部撰写剧评。对每一篇剧评，周恩来都亲自动笔修改、补充。事实证明，郭沫若的戏剧和周恩来等的剧评，是团结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推动抗日民主运动的有力武器。

四

南方局在争取民族资本家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并收到很好的效果。周恩来曾多次同康心之、余名钰、吴晋航、卢作孚等民族资本家谈话。周恩来在1942年参观余名钰的渝鑫钢铁厂时，为该厂题词：“没有重工业，便没有民族工业的基础，更谈不上国防工业。渝鑫厂的生产，已为我民族工业打下了初步基础。”

党的领导人与民族资本家的集体座谈，我记得有两次，都是在1944年国民党军队豫湘桂溃败之后。第一次是由王若飞出面召